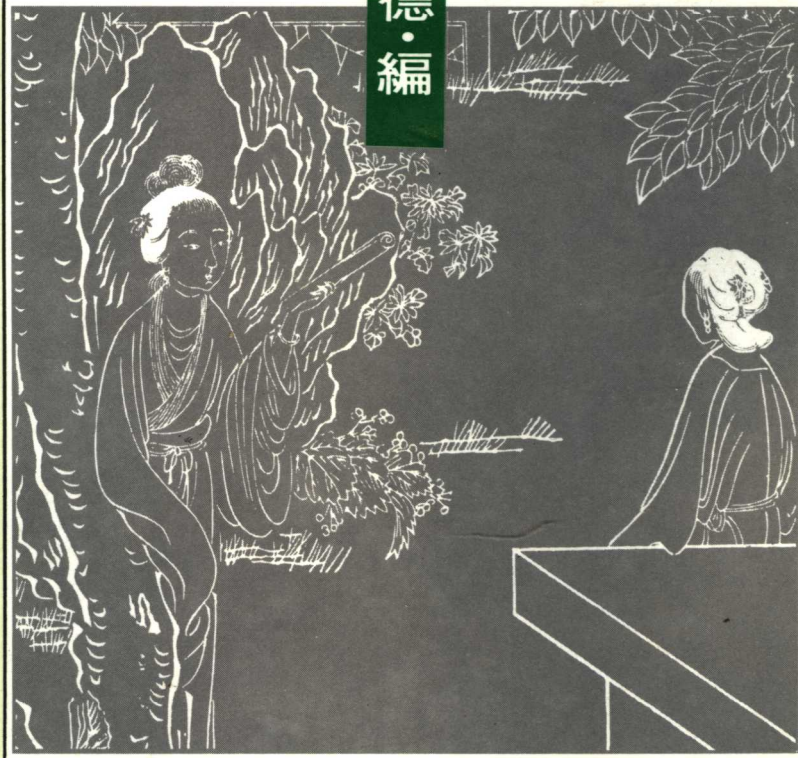


# 晚清小說研究

林明德·編



77·3·0894

·17004·

## 晚清小說研究

編者 林 明 德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

電話：六四二五 一五三八

郵 掛：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三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三五〇元

# 彌補中國文學史的一頁空白

——編序

林明德

近年來，個人由於與一些好友推動晚清小說研究，並且陸續發表了幾篇有關晚清小說的論文，引起若干朋友的興趣，馴至熱烈討論。我想「晚清小說」的研究只是一個開始，還有待大家去正視、研究的。這裏先略談「晚清小說」的概況。

晚清，大約指一八四〇到一九一一，七十二年之間，而晚清小說的蓬勃發展，却在一九〇二到一九一一，十年之間。晚清是個內憂外患頻仍的時代，也是個無論在外交、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新舊轉型的時代。在這樣的歷史大動向之下，有心之士主張小說應超越傳統的「消遣」性質，積極成為啓發民智、改革社會國家的工具，梁啓超先生是首開此一風氣的人物。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他亡命到日本，在橫濱刊行「清議報」，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一文，認為「小說為國民之魂」，希望國人讀新小說，特別是「政治小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他又在橫濱創辦「新小說」雜誌，發刊辭「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強調「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並發表一篇「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作為理論的實踐。這之後，小說雜誌盡

HWT/132/08

起：如「繡像小說」（一九〇三）、「月月小說」（一九〇六）、「小說林」（一九〇七）；創作翻譯萃出：創作四百六十一種，翻譯六百零八種。事實說明了在中國小說史上，晚清「是一個最繁榮的時代」。根據阿英「晚清小說史」的看法，晚清小說大致可以分為十二類，即：(1)反映晚清社會的，(2)反映庚子事變的，(3)反映華工生活的，(4)反映工商戰爭與反買辦階級的，(5)反映立憲運動的，(6)反映種族革命運動的，(7)反映婦女解放問題的，(8)反映迷信的，(9)反映官僚生活的，(10)反映排滿意識的，(11)吳語小說，(12)翻譯小說。

三十多年來，有關晚清小說的研究雖然還不能蔚為風氣，可是却也未曾中斷過。開始是阿英（錢杏邨）的資料整理與「晚清小說史」的撰寫，為後來學者提供研究的基礎。在日本，由樽本照雄創辦的「清末小說研究」，自一九七七年以來已推出八集，成果斐然，很受學者的重視。在西方，則以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The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一書，最能看出晚清小說的研究方向。近幾年來在臺灣有關晚清小說研究大都著重四大譴責小說上，也就是點的研究；直到民國七十三年，政治大學舉辦的晚清小說討論會，才有較為全面的研究，加上「晚清小說大系」（廣雅出版）的推出，以及七十四年「聯合文學」舉辦的「晚清小說座談會」（四月號），逐漸予國人有一較為深刻的印象，這未始不是件可喜的事。

這裏，我願意就文學史的立場來省察晚清小說與五四的關係。我認為可以從三方面來談。第一、晚清小說因梁啟超先生的努力，使「小說」取得合法的身分證，達到與詩、文同等的地位。第二、它繼承傳統，也融匯西方的文學思潮與技巧。晚清小說在空前的憂患下應運而生，當時小說家的心靈普遍瀰漫着一股焦慮感，無法冷靜下來寫作，而注重誇張嘲弄，在小說藝術的觀點

上，容或有許多值得批評的缺欠，但瑕不掩瑜，至少在結構、對話、心理刻畫、場景等力求超越傳統章回小說的種種努力，無疑地，使它成為五四新文學的先河。再說，晚清小說裏面容納大量的歷史事件，成為當代歷史的見證，此種意義自是嚴肅、不可忽視的。

總之，「晚清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特別是舊、新交替的階段，顯示的意義是十分重要，值得我們去注意。因為，當我們把「晚清小說」與它以前的傳統小說聯繫起來，並把它與五四新小說聯繫起來，我們才能對中國小說史有整體的認識，而不至於有「斷層」的現象和誤解。

基本上，「晚清小說」是前五四的本土文學運動的一環，但是自從五四以來，一直成為文學斷層部分，不受重視，的確令人惋惜。我們認為唯有正視它，並加以研究，才能清楚中國現代小說的真相，才能彌補中國文學史上的那一頁空白。

本書共收論文二十篇，分總論與分論，作者涵蓋國內外，當代研究晚清小說的路向與重要成績，於此可見一斑。近兩年來，晚清小說的研究蔚為風氣，專著散論並出，成果斐然，但是，由於本書刊印在即，來不及收錄，只好等待來日的「續編」了。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謝碧霞教授，為本書若干日英文論文翻譯成中文，美妙流利的文筆，使本書增添無限的光彩；韓仁先、李壽菊細心為本書編索引，使本書更加完美。在此謹致謝忱。

一九八七年八月林明德識於輔仁大學中文系

晚清，大約指一八四〇到一九一一的七十二年之間，而晚清小說的蓬勃發展期，卻在一九〇二到一九一一，十年之間而已。

晚清是個內憂外患頻仍的時代，也是個無論在外交、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文學各方面新舊轉型的時代。在如此歷史大動向之下，有心之士起而主張小說應超越傳統的「消遣」性質，積極成爲啓發民智、改革社會國家的工具，梁啟超先生首開風氣，辦「新小說」雜誌，撰「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寫「新中國未來記」。此後，小說雜誌遽起，創作翻譯輩出，主題既深且廣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象。

三十多年來，有關晚清小說之研究，並未曾中斷，尤其是近年來在國內、外漸漸蔚爲風氣，資料搜集與專著散論等多方面的表現，使晚清小說得以重臨大衆面前。基本上，晚清小說是前五四的本土文學運動之一環，但自五四以來，一直成爲文學斷層部分，不受重視。我們認爲唯有正視它，並加以研究，才能清楚中國現代小說的真相，才能彌補中國文學史上的那一頁空白。



林明德，民國三十五年生於臺灣高雄。畢業於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並獲輔仁大學中文碩士，目前為國立政治大學中文博士候選人。現任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著有：〈金源文學家小傳〉、〈金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晏幾道及其詞〉、〈唐詩的境界〉、〈唐宋詞選——跨出詩的邊疆〉、〈中國傳統文學探索〉、〈文學批評指向〉等書。

# 目次

彌補中國文學史的一頁空白——編序	林明德	(一)
晚清的歷史動向及其與小說發展的關係	張玉法	一
晚清小說概觀	澤田瑞穗	二九
新小說的提倡者：嚴復與梁啟超	夏志清	五九
「新小說」的興起	Shu-ying Tsau	九三
論晚清的立憲小說	林明德	一一一
論晚清的華工小說	賴芳伶	一五五
〔官場現形記〕的眞偽問題	樽本照雄	一八五
附錄一 〔官場現形記〕審判		二〇四
附錄二 〔官場現形記〕的初期版本		二〇八



〔官場現形記〕與晚清腐敗的官場……………	林瑞明	二一五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與晚清的末世現象……………	林瑞明	二四三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評價……………	陳幸蕙	二六九
〔老殘遊記〕新論……………	夏志清	二八五
劉鐵雲與〔老殘遊記〕……………	樽本照雄	三一一
〔老殘遊記〕與晚清社會……………	林瑞明	三三九
論〔孽海花〕的小說藝術……………	賴芳伶	三六一
晚清四大小說的諷刺對象……………	吳淳邦	四〇五
〔文明小史〕的主題和人物類型……………	周宰嬉	四四五
清末民初的舊派言情小說……………	李健祥	四八一
晚清小說中的情節結構類型		
……………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五一五
晚清小說中的敘事模式		
……………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五四二

索引

# 晚清的歷史動向及其與小說發展的關係

張玉法

## 一、前言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七、八十年間，是中國歷史脫離傳統、開始步入現代化的時代。在這七、八十年當中，歷史的發展是多方向的，其與小說的發展有關者，約有六方面：(1)資本主義的經濟侵掠，(2)西方文化的流布與擷取，(3)新知識份子取代舊士紳，(4)從政治改革的要求到種族革命，(5)開民智與興女權，(6)都市化與新聞事業的發展。本文即就此六方面加以檢討。

## 二、資本主義的經濟侵掠

工業革命於十八世紀下半期發生於英國，十九世紀上半期傳入歐陸，十九世紀下半期傳入美洲、亞洲、非洲<sup>○</sup>。在工業革命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有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最初特徵，是透過新機器的應用、技術的改良、妥善的經營，使工業生產品價廉物美，以達到在自

由競爭中獲勝的目的。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則以銀行資本向工業界入侵，以達到以少數銀行控制各種工商業之目的。於是由貨物輸出到資本輸出，遂為資本主義自然膨脹之結果<sup>①</sup>。

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初為英國，次為歐陸之法、德等國，再次為美、日等國。資本主義國家向外擴張，初以通商、傳教為主，通商、傳教受阻，則繼以軍事侵略。軍事侵略獲勝之後，即獲取更多利權。一八四〇年英國假鴉片貿易受阻為名，侵略中國，勝利之後，中國割讓香港，並開上海等五口通商，鴉片貿易自然解禁。一八五八至一八六〇年，英、法兩國假通商、傳教受阻為名，侵略中國，勝利之後，中國開漢口、天津等十二口通商，割讓九龍於英，允許外人在內地傳教，允許外國軍艦商船至內河航行，洋貨進口關稅議定值百抽五，另繳百分之二·五的子口稅，可免受釐卡的限制。在擴展通商、傳教的過程中，資本主義國家復對中國的藩屬加以掠奪。一八八四年，法國為控有安南，向中國開戰，勝利之後，法國獲得安南、獲得陸路通商的權利、獲得華南鐵路建築的權利。一八九四年，日本為控朝鮮，向中國開戰，勝利之後，日本獲得朝鮮，日人可在中國通商口岸設工廠，中國開放重慶等四口通商。中日戰爭以後，列強見中國積弱不振，欲加以瓜分。於是德國劃山東為勢力範圍，法國劃雲南為勢力範圍，日本劃福建為勢力範圍，俄國劃東三省為勢力範圍，英國劃長江流域為勢力範圍。英、美兩國懼列強在中國發生衝突，影響商業利益，乃於一八九九年倡導中國門戶開放政策，一面要求各國保持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一面要求在每個勢力範圍內，各國通商投資不受干涉。因為此一政策符合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遂為各國所接受。雖然次年會因義和團之亂引起八國聯軍，八國聯軍勝利後，列強在中國獲得更多的利權，並使京畿的國防盡撤，各國仍然聲言維持中國領土及行政的完整。此後，中國在

列國勢力均衡下，維持了十一、二年的安定，晚清小說的發展，主要在這個時期。

資本主義國家的勢力侵入之後，中國的工業、礦業、交通、運輸、金融、進出口等方面的經濟活動，無不受其影響，或受其控制。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出現兩種人，一種人進入外國的商行，爲其服務，從中獲取報酬，或利用機會賺取利潤，此即買辦。另一種人，與外商處於競爭對抗狀態，包括官僚、士紳、新知識份子和新興的商人在內，提倡商戰，要求收回利權，努力於自辦實業，或假商戰或自辦實業之名，圖謀私利。這兩種人，都出現在晚清的小說中。

中外商業在鴉片戰爭以前，原由廣州的公行（十三洋行）壟斷，鴉片戰後，開五口通商，公行制度廢除，外商直接與中國商人貿易，乃大量雇用中國人爲媒介，而有買辦行業的興起。所謂買辦，爲洋行中的華籍經理，負責該行與中國人之間的交易，他們替洋行物色中國籍的辦事員、管理中國籍的辦事員、替洋行管賬、提供市場消息、爲中國銀行的票據作保證、並幫助外國經理與中國方面辦交涉。外國商行在中國所作的經濟活動甚爲廣泛，以英國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爲例，從一八三二年創立，迄於一九〇四年間，所經營的事業有進出口、運輸、倉儲、保險、銀行、工業、投資、電力等<sup>①</sup>，自然需要許多中國人員的協助。

任職於洋行的中國人，很難統計，重要的買辦，據估計，一八五四年時約二五〇人，一八七〇年時約三五〇人。買辦初以廣東人爲多，其後浙江、江蘇人漸居重要地位。在一九二〇年代著名的一百個買辦當中，浙江占四十三個，江蘇占三十一個，廣東占七個，安徽占五個，江西占一個，不詳籍貫者三個。著名的買辦，有一八六三至一八七三年在怡和洋行任職的唐景星，有一八七三至一八八一年在英國太古洋行（Butterfield and Swire Co.）任職的鄭觀應，有二十世紀

初年曾在華俄道勝銀行任職的虞洽卿等。買辦因為報酬、佣金優厚，又有機會從事貿易活動，極富資財。他們大量投資於中國新興的工業、礦業、運輸業（包括鐵路、航運）等，如唐景星於一八七七年投資於開平煤礦三十萬元，鄭觀應投資於各種新式工業達四十萬元<sup>④</sup>，對中國的經濟現代化甚有貢獻。不過，他們在中國身受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侵略的時代，在中國人提倡商戰和收回利權的時代，也常被指為「漢奸」。他們在小說中的角色，經常是醜陋的。如吳趸人的「發財秘訣」，一名「黃奴外史」，即痛詆買辦階級無恥<sup>⑤</sup>。

商戰觀念起於國人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商業競爭的了解，如一八六二年兩江總督曾國藩謂「秦用商鞅以耕戰二字爲國，……今之西洋以商戰二字爲國」；十九世紀末年買辦商人鄭觀應謂「西人以商爲戰，士農工爲商助」<sup>⑥</sup>。十九世紀中外進出口貿易在沿海競爭激烈<sup>⑦</sup>，各國更進一步在中國設工廠，企圖壟斷中國市場，乃激使官商學界起而從事商戰運動。以官僚的身份從事商戰者，如直隸總督李鴻章、兩湖總督張之洞，他們竭力倡導工業化，與辦各種企業，以抵制外人的經濟侵略。不過他們所倡導的企業，一切要接受官家的督導和控制，與商人之間有很大的距離，並違反近代自由企業的精神<sup>⑧</sup>，所以成就不很大。以商人身份從事商戰者如鄭觀應，自謂「投身於商戰場中已三十餘年」，並謂「初則學商戰於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欲挽利權以塞漏卮，惟志大才疏，未酬夙願」<sup>⑨</sup>。可見鄭觀應在商戰場上亦不順利。以學界人從事商戰者如南通狀元張謇，於甲午戰後在南通辦大生紗廠，並種棉花、創電力、辦銀行、興墾牧。由於他出身士紳，可免除官方的騷擾，又注意關係企業的經營，頗獲成功<sup>⑩</sup>。

在地方官及商學兩界人士的倡導下，商戰觀念普遍爲關心中國富強的人士所接受。一九〇三

年清廷成立商部，一九〇六年改爲農工商部。一九〇三年頒訂公司法，一九〇六年頒訂破產法，各大城市的商會也相繼成立，使保護商業走向合法化和合理化。清廷鼓勵商戰更具體的做法是一九〇六年十月商部改爲農工商部前夕所頒布的勳商章程，此章程對投資大加獎勵，規定投資現代企業二十萬元以上者封一等子爵，另有二等子爵、三等子爵、一等男爵、二等男爵、三等男爵、三等卿、四等卿、五等卿、六等卿、三品銜、四品銜、五品銜等規定。在中國歷史上，爵位多封賜予有軍功者，清廷將之封賜給興辦新式企業者，可以看出其着重商務、獎勵投資之誠意<sup>①</sup>。

在言論鼓吹和政府獎勵下，光宣年間出現一片興辦實業的熱潮。大部分人在默默耕耘、刻苦奮鬥，小說中却甚少以此作爲題裁。倒是少部分假收回利權、創辦實業、提倡國貨之名、中飽夥友資金、招搖撞騙者，爲小說家所譴責，作爲諷刺的對象。如姬文所寫的「市聲」<sup>②</sup>。

### 三、西方文化的流布與擷取

隨着西方商務和傳教事務進入中國，西方文化開始在中國流布。西方文化進入中國，部分是由外人傳入的，部分是由中國人自己擷取的。外人傳入西方文化，除商務和教務本身的勢力和影響外，主要有三個管道：其一爲外國教會在中國所辦的學校，其二爲外人在中國所辦的報刊，其三爲外人在中國所組織的文化團體。

外人在中國所組織的文化團體，以廣學會最有名。一八七七年，在華新教傳教士第一屆大會決議組織「益智書會」(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由韋廉臣 (Rev. Alexander Williamson) 任秘書。一八八七年益智書會解散，韋廉臣另組「同文書會」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一八九四年該會中文名稱改為廣學會，一九〇五年該會英文名稱改為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廣學會直到一九四三年始與其他團體合併。該會以出版書刊、介紹西方文化、鼓吹中國改革爲目的，會員在一八八八至一九〇五年間由二、三十人增至二百五十餘人，以傳教士爲主，亦有外交人員、稅務人員及商人參加，清末先後任督辦者有韋廉臣、慕維廉 (W. Muirhead)、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等。一八九七至一九一一年間出版有宗教性的書籍八十五種、二六〇、二五〇冊；非宗教性的書籍二三八種，六九二、八五六冊。非宗教性的書籍包括法政、財經、外交、教育、史地、社會、人文、傳記及自然科學各方面。對於中國學術思想的西化，自然有很大的影響。

外國人在中國所辦的報刊甚多，英文的以「北華捷報」、中文的以「萬國公報」最有名。「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 於一八五〇年創於上海，係英文週刊。影響於中國人者較少，此處不多介紹。「萬國公報」亦在上海發行，係月刊，由創刊於一八六八年的「教會新報」演變而來。「教會新報」爲週刊，一八七二年八月改名「教會新聞」，一八七四年改名「萬國公報」後，改爲月刊。由林樂知 (Y. J. Allen) 主持。「萬國公報」發行九年後一度停刊，到一八八九年二月復刊，成爲廣學會的機關報<sup>②</sup>。「萬國公報」在復刊之初，每年總發行量不過萬餘份，其後發行量漸增，可知者一八九七至一九〇七年間，每年總發行量從二萬餘份至五萬餘份不等，十一年的總發行量爲四〇六、七二二份<sup>③</sup>。「萬國公報」的內容除教義及傳教活動外，以介紹西方的政教、風俗爲多，並有大量文字鼓吹中國改革，財經方面如建議設立銀行、廢除釐卡、

改革稅制和幣制，政治方面如建議改革吏制、主張親英抗俄，教育方面如建議改革八股考試、建立新學制、增加留學人數等，對清末維新份子如王韜、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都有很大的影響<sup>⑤</sup>。

外國教會在中國所辦的學校，一八六三年時的講書堂、義學及學堂數為三十九，一八六六年時的學生數為三、一二四人，其後迄於一九一〇年代（民國初年）的四十年間，學校數增至五〇三四，其中初小四、一三八所，高小四三六所，中學一七六所，大學三十八所，師範學校四十所，神學校一四三所，職業學校五十所，醫學堂十三所。學生人數，初小八〇、七六二人（其中女生二八、〇六三人），高小二〇、四八三人（女生九、九四二人），中學一〇、〇四一人（女生二、八〇八人），大學二、八三六人（女生二二二人），師範九二九人（女生一八七人），神學校三、五二四人（無女生），職業學校九三二人（女生八六人），醫學堂四四一人（女生十二人）。學校主要的分佈地區是福建、廣東、山東、四川、浙江、東三省及雲南。民國初年，教會學校學生人數（一一九、九四八人），約為中國公立學校學生人數（一、六一〇、五三五人）的十三分之一<sup>⑥</sup>。

中國人主動攝取西方文化，主要有三個途徑：其一、翻譯外國書報，其二、設立學堂，教授現代知識，其三、派遣留學生，分赴各國留學。

在翻譯外國書報方面，約可分為五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由十六世紀末至十八世紀末（一五八四—一七九〇），主由各國在華耶穌會教士翻譯，先後參與翻譯工作的耶穌會教士至少八十人，翻譯的書籍四三七種，其中百分之五十七屬於天主教義，百分之三十屬於自然科學，百分之十三



屬於人文及社會科學。高一志 (Vagnoni) 編譯的「西學治平」(一六三〇) 是第一本有系統地介紹西方政治學的中文書，而艾儒略 (Julius Aleni) 所編譯的「西學凡」(一六二三) 則介紹了歐洲各大學的課程。第二個時期在十九世紀初葉和中葉 (一八一〇—一八六七)，主由各國在華基督教士翻譯，先後翻譯的著作七九五種，其中百分之八十六屬於基督教義，百分之六屬於自然科學，百分之六屬於人文及社會科學，百分之二屬於其他方面，麥都士 (Walter Henry Medhurst) 編譯「一本東西比較的歷史，題名「東西史記和合」(一八二九)，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編譯「一本介紹美國地理的書，題名「亞美利哥合省國志略」(一八三九)。第二期在十九世紀後半期 (一八五〇—一八九九)，由中國政府和私人所翻譯的書共五六七種，其中自然科學占百分之七〇·四，人文及社會科學占百分之二一·七，其他占百分之七·九。一八四〇年前後兩廣總督林則徐找人所翻譯的西方書報，部分編入魏源的「海國圖志」(一八四四)；一八七〇年代，丁韞良 (William A. P. Martin) 主持同文館時編譯了一本「萬國公法」。從事翻譯的政府機關有同文館、廣方言館、江南製造局等，私人機構有傅蘭雅所創設的格致書院 (一八八四)、上海文化界人士所創設的譯書公會等。第四個時期在二十世紀前半期 (一九〇〇—一九四〇)，譯書漸多，教士的角色亦漸不重要。在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四年間所譯的五三三種著作中，自然科學占百分之三一·五，人文及社會科學占百分之六一·四，其他占百分之七·一。重要的譯著有嚴復的「國富論」(一九〇二)、「羣己權界論」(一九〇三)等。大概說來，甲午戰前所譯的書以來自英國者爲多，甲午戰後以來自日本者爲多，到一九〇五年以後，中國大陸的譯書，則以來自俄國者爲多<sup>②</sup>。